

农村流动人口“回流”动因的社会学分析

喻佳

(温州大学,浙江 温州 325035)

摘要:当下我国“回流”正经历“生存型”向“社会理性型”转变,经济、制度、社会等因素共同作用与影响着农村流动人口做出“回流”决定。同时,我国的“回流”现象可分为主动“回流”与被动“回流”,而被动“回流”的出现不仅展现出我国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的艰难,更对我国城市化的发展造成影响。其中产业结构升级、多项制度脱嵌、社会认同度低成为城市推离农村流动人口的主要力量;惠农政策的不断推出,血缘、亲缘、地缘的影响成为农村拉回农村流动人口的主要力量。发展小城镇、加快制度建设、加大新型农民的培育、发展农村多元化经济成为改善这一现象的有力措施。

关键词:农村流动人口;人口回流;社会学分析

中图分类号: C9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31X (2016) 03-0115-06

一、问题的提出

国家政策允许农民进城以来,曾经出现过一些规模较大的农村流动人口“回流”现象,如:乡镇企业的变革,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金融危机的发生等等,都曾引起农民规模性的回流。当前,国家大力推进城镇化,中央和地方有利于农民市民化的政策陆续出台,但农村流动人口“回流”现象依然存在。深入分析回流原因,探索其合理科学流动所需的各项保证条件,对城镇化发展和新农村建设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前期农村流动人口“回流”的行为出发点主要集中在对更高经济收益、更低机会成本的权衡,属于生存理性型选择,而当下城市工资收入基本能够满足生存需求,农村流动人口“回流”的主要因素除经济因素外还包括个人发展、社会认同、归属感获得等社会因素,更多的趋向于社会理性型选择。因此,我国

农村流动人口“回流”现象较之前已发生改变,逐渐的向追求生存需求以外的自我实现需求转变,呈现出“社会理性型选择”趋势。可以分为两种:积累了一定资本后为追求更好生活而回乡创业的主动型“回流”;因城市高生活压力而出现的被动型“回流”。但是“主动回流”返乡创业只是个别地区的个别现象,并没有形成“创业潮”;“被动回流”才是大规模返乡的主要原因。“被动回流”是城市生活对于农村流动人口的“淘汰”,其产生原因众多,既包括经济因素、制度因素、社会因素,也包括农村流动人口的自身因素。“被动回流”的出现说明了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生活艰难和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潜在的危机,对其展开研究十分必要。因此,本文试图从经济、制度、社会等方面入手,对“被动回流”出现的原因进行系统分析,并以此为基点提出一些建议。田野调查选择在温州市开展,理由是温州是沿海发达城市,涌入大量农村流动人口。本文采用问卷调查和结构性访谈两

收稿日期:2016-03-07

基金项目: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暨新苗人才计划“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野下‘五水社会共治’研究”(项目编号:2015R426052)。

作者简介:喻佳(1991-),女,浙江杭州人,温州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喻佳：农村流动人口“回流”动因的社会学分析

表 1 农村流动人口城镇化意愿列联表的显著性检验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婚姻状况	月收入	来城市的时长
Pearson 卡方检验 P 值	0.986	0.000	0.001	0.824	0.008	0.4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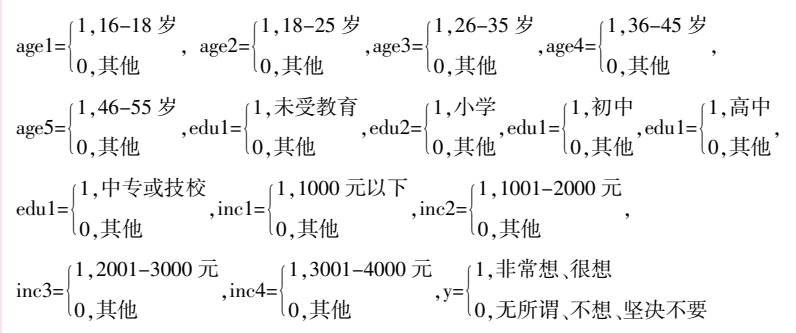


图 1 城镇化意愿回归分析

种方法,在温州市选择六个城中村和附近工厂,从他们中按年龄、职业、户籍等选择一部分流动人口(规模在 50 人左右)进行深度访谈,访谈目的是进一步了解他们在城市化过程中心理上、价值判断等方面的真实想法,为本文定性研究部分提供更为丰富的资料;与此同时,采用随机抽样方法选取 750 个样本进行问卷调查。文中所用数据和案例均来自调研结果。

表 2 Hosmer 和 Lemeshow 检验表

步骤	卡方	df	Sig.
1	107.622	8	0.000

在此我们将对流动人口的城镇化意愿进行分析,对流动人口的城镇化意愿分别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月收入 and 来城市的时长这六个方面进行列联分析结。结果如表 1。

所以我们将针对年龄、文化程度和月收入这三个因素和城镇化意愿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考虑的各因子多水平对回归的影响,我们将引入虚拟变量,将三个因子全部转化为 0-1 变量,变化如图 1。

根据表 2 Hosmer 和 Lemeshow 检验表可知,模型检验的拟合优度仅为 0.000 远小于 0.05,说明模型拟合很差。通过表 3 的系数检验 P 值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年龄和文化程度的大部分系数均大于

二、农村流动人口中“回流”人群的界定

农村流动人口“回流”,是指在城市生活和工作了一段时间的农村人口重新返回户籍所在地,在村中居住并有较长时间没有再进城务工的现象。到底这一群体中哪些人已经回流或即将回流,我们对调研数据的分析来加以界定。

表 3 Logistic 回归系数表

		B	S.E.,	Wals	df	Sig.	Exp(B)
步骤 1 ^a	age1	1.572	0.774	4.128	1	0.042	4.815
	age2	−0.205	0.675	0.093	1	0.761	0.814
	age3	−1.226	0.695	3.115	1	0.078	0.293
	age4	−0.476	0.682	0.486	1	0.486	0.621
	age5	−0.190	0.716	0.070	1	0.791	0.827
	edu1	0.069	13210.524	0.000	1	1.000	1.071
	edu2	18.235	6018.898	0.000	1	0.998	83043211.799
	edu3	19.262	6018.898	0.000	1	0.997	2.319E8
	edu4	20.447	6018.898	0.000	1	0.997	7.589E8
	edu5	19.177	6018.898	0.000	1	0.997	2.129E8
	inc1	−1.154	0.688	2.817	1	0.093	0.315
	inc2	−1.014	0.492	4.254	1	0.039	0.363
	inc3	−2.801	0.354	62.744	1	0.000	0.061
	inc4	−1.180	0.258	20.904	1	0.000	0.307
	常量	−19.257	6018.898	0.000	1	0.997	0.000

表 4 Hosmer 和 Lemeshow 检验表

步骤	卡方	df	Sig.
1	.000	2	1.000

0.05，考虑到文化程度和月收入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线性关系，因此我们将年龄和文化程度两个因子剔除模型，仅保留月收入这一个因子进行回归模拟。

通过表 4 可知模型检验的 P 值为 1.000 远高于之前的 0.000，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有极大的提升。再看表 5，各系数的检验中 inc1 和 inc2 的 P 值未通过检验，说明这两个因子对因变量不够显著。总体而言，系数检验存在着不尽人意的情况，但拟合优度这一项反映出本模型对结果的预测有较高的精确度。这满足我们对着本模型的基本要求，模型如此建立是适合的。

由此我们得到的模型为：

$$P=\frac{\text{Exp}(0.484-0.363\text{*inc1}-0.363\text{*inc2}-2.395\text{*inc3}-1.028\text{*inc4})}{1+\text{Exp}(-0.484-0.363\text{*inc1}-0.363\text{*inc2}-2.395\text{*inc3}-1.028\text{*inc4})}$$

利用该模型预测月收入的流动人口是否愿意留在本地：

当 inc1=1，其余为 0 时，P1=0.300，说明月收入在 1000 元以下的流动人口有 30.0%愿意本地化。

当 inc2=1，其余为 0 时，P2=0.294，说明月收入在 1001-2000 元的流动人口有 29.4%愿意本地化。

当 inc3=1，其余为 0 时，P3=0.053，说明月收入在 2001-3000 元的流动人口有 5.3%愿意本地化。

当 inc4=1，其余为 0 时，P3=0.181，说明月收入在 3001-4000 元的流动人口有 18.1%愿意本地化。

当全部为 0 时，P4=0.381，说明月收入在 4000 元以上的流动人口有 38.1%愿意本地化。

经过以上分析并结合图 2 可以看出，整体的本地化意愿曲线呈 U 型曲线。低收入和高收入的比中等收入的流动人口更希望获得当地户口，即对温州的归属感更高。而这一现象值得我们进行后续研究。月收入 1000 元以下和 1001-2000 元的居民的本地化意愿比较接近，可见低收入的意愿比较统一，而从月收入 2000 元起，月收入越高流动人口的本地化意愿越强(表 6)。

表 5 Logistic 回归系数表

		B	S.E.	Wals	df	Sig.	Exp(B)
步骤 1 ^a	inc1	−0.363	0.511	0.504	1	0.478	0.696
	inc2	−0.363	0.377	0.924	1	0.336	0.696
	inc3	−2.395	0.306	61.120	1	0.000	0.091
	inc4	−1.028	0.231	19.860	1	0.000	0.358
	常量	−0.484	0.153	10.018	1	0.002	0.616

表 6 收入情况表

您每月的收入是	1000 以下	1001-2000	2001-3000	3001-4000	4001 以上
	20 人	40 人	282 人	227 人	181 人
	2.68%	5.37%	37.58%	30.20%	24.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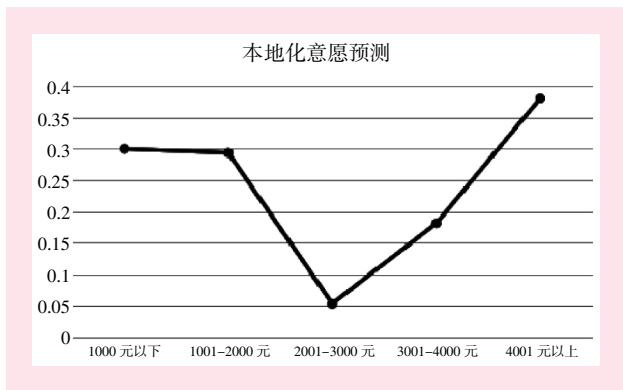


图 2 本地化意愿预测图

问卷发放地当年平均工资 3700 元左右。收入 2000 元以下的农村流动人口愿意留在城市，接受城镇化，更多的还是心里上对城市生活充满了憧憬和期待，在城市顽强生存。但这部分人多数文化水平较低，不适应城市发展需要，应当适当考虑返乡。收入在 4000 元以上人口，多是技能型或文化水平较高，他们在城市基本能站得住脚，38.1%的人愿意留在城市。收入在 2000-3000 元的人口是“回流”的主体。他们文化水平以初中、高中居多，因为就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住房、农村财产等等原因选择“回流”，而这部分人中有很大比例是未来城镇化的对象。因此，本文以该群体为主体，分析“回流”动因，以期深入解读现象。

三、“回流”的动因分析

(一)动因之一：城市的主要推力

1.产业结构升级

随着城市经济的提升，城市产业面临着多重压力，高昂的土地费用、人力资源费用以及相较于中小城市无比激烈的行业间竞争，导致城市产业发展边际效益逐渐下降。边际效益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在城市发展的重要考量依据，从其下降趋势中我们能够发现当下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聚集效应弱化，只有进行产业的升级，具有高技术含量的生产行为才能够较好的存在于城市。而产业结构不断升级

的行为在提升生产率的同时,也导致了“机器换人”现象的出现。农村劳动力具有教育、技能等人力资本因素低于城市劳动者的特点,在产业结构升级所导致的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潮中逐渐被淘汰。

2. 多项制度脱嵌

(1) 户籍制度。户籍制度对于农村流动人口的影响巨大,由其派生出的各类政策更导致了这一群体与城市居民的多项待遇差距,使得农民在城市,无论是就业机会、工资待遇、就业保障都无法实现与城市居民的平等。促使农民工经济和社会地位低下,从事“脏险累”工作,更甚至因“农”这一特征而被市民“边缘化”与“妖魔化”,城市融入艰难。

(2) 社会保障。不正规就业所引起的劳工关系不确定以及社保存在转移接续问题等导致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社保参与状况一直不佳。根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08~2014年,农村流动人口参加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的比例都有所增加,但是其整体水平依旧不高,至2014年分别为16.7%、26.2%、17.6%、10.5%、7.8%。社保的低参与率使得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生活无法得到保障,更带有隐性经济风险。在生活中他们普遍表示“不敢生病”,而新农合却因为转移接续问题无法对外出的未参加城市医疗保险的农村流动人口提供保障,这便导致了“两端真空”现象,使得他们的生活抗风险能力不足,面对未来的不可预期显得弱不禁风。因此,务工地社保参与率低,生活保障性差,导致其城市生活缺乏风险规避路径,不利于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生活。

(3) 就业制度。农村流动人口城市就业,难以实现同工同酬,还存在企业肆意克扣、拖欠工资的现象。近年来随着政府监管力度的加强,农村流动人口的工资有了一定程度的保障,但是其整体就业环境、工作时间等相关权益依旧处于“失保”状态。从工作时间看,国家法定工作时间为每天8小时,而据2014年统计局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日工作超过8小时的农村流动人口比例为40.8%,周工作超过44小时的比例为85.4%。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从收入看,2014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人均月收入为2864元,比上年增长255元,增长率为9.8%,但却远低于2010年的19.3%及2011年的21.2%,城市工资出现增长放缓现象。随着人们维权意识的提高,农村流动人口对于权益保障的要求提升,但实现这一诉求的路径相对缺失。当下较多的农村流动人口会以“同乡”形式集成小群体以维护自身权益,由于这一方式维权的局限性,暴力和极端事件经常出现。

(4) 住房。农村流动人口的住房环境较差,多数租住在城中村,另有住工棚或一些建筑物避雨处等等。廉租房制度旨在解决社会金字塔结构最底端人

群的住房问题,但却面临着建设资金短缺、供给量不足、覆盖范围小、准入退出机制存在漏洞等问题,农村流动人口很难享受到。公共租赁房是政府用低于市场价或按承租者能承受的价格向新就业职工出租的部分房源,其受益群体包括新的大学毕业生,以及外来务工群体。但是公共租赁房的申请条件却成为了绝大多数农村流动人口无法跨越的围栏:申请人应在主城区有稳定工作和收入来源;与用人单位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且在主城区连续缴纳6个月以上的社会保险费或住房公积金等。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社保参与率低、多数人没有和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因此,因资格审定、房源供给、申请条件等的受限,阻碍了农村流动人口通过其缓解住房压力的可能。

(5) 子女教育。户籍制度影响,城市教育资源有限,农村流动人口家庭收入少等原因,都导致了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在城市的教育受到限制。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人口出现大量流动以来,暂住证便开始在我国大中型城市陆续实行。如期上交暂住费成为流动儿童入读公立学校的考量标准。但其收取制度存在较大的漏洞,导致暂住证的办理成为农村流动人口较大的负担,阻碍其子女就读公立学校。近年来该制度被取消,但是并没有使得限制性条件消失,学生在非户口所在地上学,依旧需向学校上交“借读费”。尽管教育部一再强调禁止收取该类费用,但效果并不显著,导致多数进城农民家庭无法支付该类费用,子女只得就读于打工子弟学校。另一方面,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即使就读于公立学校依旧面临着多重压力,与城市孩子自小接触教育的差距以及家庭生活背景、习惯的差异使得其心理极易产生自卑感,班级融入度不足,较易出现自我认同危机。因此,流动儿童城市公立学校就学状况不容乐观,面临多方压力:入学艰难、家庭财政负担大、心理压力重等。

3. 社会认同度低

二元经济结构下城乡间的经济差距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但教育水平、生活习惯、道德认识等多方面的差异使得城市居民对农村流动人口存在着“素质低下”的“刻板印象”。即使在后期农村经济面貌得到改善,进城务工农民多方面发生改变,但在前期“刻板印象”的作用下,市民对于农民依旧不具有平等意识。同时,教育、技能、社会网络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农村流动人口大多就业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作具有“脏险差”的特点,与城市居民所从事的行业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而这种职业的差异更促进了新“印象”与旧“印象”的叠加,加深了市民对农村流动人口的“排斥”。

社会网络关系是社会成员重要的社会资本,进城务工农民面临原有社会网络的破裂,极度需要重建新的社会网络关系,其网络的重建对象主要包括居住地周边人员、工作地人员、老乡。但是近年来高

涨的房价、就业信息来源有限、工作强度大、休闲娱乐活动少等使得农村流动人口居住地主要集中于城中村或郊区村镇,行业“同乡”性显著,社会交往对象呈现“单一性”,如北京的“浙江村”、温州的“安徽的哥”。在这一“单一”趋势的影响下,原本破裂的社会网络关系并没有实现在城市的重建,只是农村遗留关系的“捡拾”,与城市居民之间依旧存在“距离感”,对城市的认同度不高,城市归属感缺失,一旦出现更大的利益驱动,极易离开。

（二）动因之二：农村的主要拉力

1. 惠农政策

“剪刀差”作用下的农村经济落后于城市,但是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投资力度,惠农政策不断提出。从2004年到2014年,中共中央连续11年将1号文件聚焦于三农问题,中央财政支持三农的投入从2004年的2626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将近14000亿元,年均增长达到21%。企业在农村的投资,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大棚种植等技术的引进,在提高农村整体生产效率的同时,更是使当地村民享有土地流转租金、种植地雇佣工资、农业收入等多种收入来源,生活水平得到极大的提升。同时,新型农村医疗合作保险制度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的“两免一补”政策,“四减免”、“四补贴”政策,科技兴农策略等一系列惠农政策的提出更是使得农村发展迅速,农民生活得到极大的保障,被农民称之为“种地不交税、上学不付费、看病不太贵、养老不犯愁”。

2. 新农合、新农保保障农民的生存权

随着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集体经济解体,农村合作医疗也失去了依托,“看不起病”成为了农民的心声,甚至出现了“做个阑尾炎,白耕一年田”、“救护车一响,半头牛白养;住上一次院,全年活白干”、“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的顺口溜,农村居民健康状况逐渐下降。但自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强化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中再次将农村合作医疗重新提上议程,农民的医疗保障开始进入新阶段。新农合与老农合的最大不同在于政府财政在资金投入中占据“大头”,农民只需定期缴纳少量费用,便可以在生病时报销,享受国家医疗补贴。新农合的出现保障了农民的健康医疗生活,提高了农村家庭的抗风险能力。农村“养儿防老”观念盛行,但随着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出现,这一观念得到了改变与发展。新农保以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三者结合为基础的筹资模式,与家庭养老、土地保障、社会救助等其他社会保障政策措施相配套的实施方式,使得农民在乡村的养老压力大幅度减小,农民养老条件大大提升,弥补了农村养老方面的缺失,实现“养儿防老”以外的“老有农合”新模式。因此,新农合与新农保的出现使得农民生活成本、就医

压力减少,原有的“看病难”困境、“养儿防老”单一模式得到改变,生活得到保障。

3. 农村的义务教育

农村教育相较于城市教育存在着资源落后现象,但是随着近年来国家开展的撤点并校政策的实施,使得农村的教育资源聚集,教育水平得到提升。处于户籍所在地的农村儿童,不仅能够获得较高质量的教育,享受义务教育所带来的“两免”优惠,家庭贫困学生还可以受到“一补”政策的支持,上学不必支付费用更能够得到生活补助。为了保障孩子的身体健康,2009年起我国更是开始实施“蛋奶工程”,改善农村孩子的营养状况。因此,相较于在城市受教育中面临的高择校费压力,农村义务教育在保证教育质量的同时,亦能够实现家庭隐性收入的增加。同时,在户口所在地接受教育的儿童不必面对城市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教育差距所造成的心理压力,能够更好的享受学习与生活,获得健康的心理成长环境,对于自我认同的获得十分有利。

4. 血缘、亲缘、地缘的影响

中国的乡村是一个熟人的社会,血缘、亲缘、地缘共同形成了中国乡村中的差序格局。其中的人际关系能够为人们带来极大的便利,且离家乡所在地越近,这一关系网络所能够发挥的作用便越大。在这一社会网络中农民的“同乡情节”十分凸显,“远亲不如近邻”观念深重,人们在“乡土”这一地区处事存在既定规范,活动便捷性较好。同时,乡村生活具有较大的“宗族性”,即使在现代社会中原有乡村的氏族性质被现代化发展逐渐打破,但是其“血缘”基础上的“亲缘”关系依旧存在,加之“地缘”优势,使得农民关系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因此,血缘、亲缘、地缘联合作用下农民在农村所获得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是“原子化”生活模式蔓延的城市生活体会所难以比拟的。

四、关于“回流”的政策建议

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明晰了我国城镇化的发展趋势,提出了推进城镇化的六大主要任务,其中一项主要任务便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表明,解决好人的问题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同时,回流到农村的农民工,也是农村社会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力量。因此,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促使农村流动人口科学的流动、落地,对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都十分必要。

（一）促进农村流动人口城镇化

1. 发展小城镇,促进农村流动人口在小城镇实现市民化

这样既可以缓解大城市人多地少的矛盾,又能减轻他们的生活压力。而这些地区所具有的“血缘”、“地缘”优势,对农民具有吸引力,加大了就地城镇化的可行性。同时,就地城镇化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减缓农村流动人口被动回流的速度和规模，从而有利于城镇化进程的推进。

2. 加快制度建设，加速市民化进城

首先，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完善配套政策，促进城乡居民“无压力流动”；其次，发展教育及培训，提高农民竞争力，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再次，实现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减少市民化成本；第四，大力促进整户转移，降低可逆性，为其城镇化解决后顾之忧。

(二) 积极发挥回流农民工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

1. 加大新型农民的培育，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

回流现象的发生为农村带回了劳动力，在现代化的推动下，新型农民的出现将使农村现代化发展提供丰富的支持，因此，加大回流人员的现代农业技能培育，提高其农业素质，对于农村现代农业的发展十分有利。

2. 发展农村多元化经济，实现回流人群价值转移

农村经济的发展必须走现代化与多元化道路，对于技能、经验以及管理能力的需求逐渐加大，回流人群作为“原住民”对地区的熟悉使得其能够更好的了解农村的需求，而其外出务工经历恰好能够满足农村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源需求，进而实现自身价值的转移，促进农村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6,(05):113.
- [2] 刘铮.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现实悖论——“农民工回流”的成因及效应分析[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3):127.
- [3] 国家统计局.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N].中国信息报,2015-04-30(001).
- [4]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203.
- [5] 蔡昉.劳动力迁移的两个过程及其制度障碍[J].社会学研究.2001,(04):48.
- [6] 黄余国.关于回流农民工问题的研究[J].华东交通大学学报,1999,(4):94.
- [7] 江小容.中国农民工回流问题研究[D].西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7:11.
- [8] 蔡禾,王进.“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7,(06):86.
- [9] 章刚勇,阮陆宁.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宏观层面解释[J].经济研究参考,2009,(30):12.
- [10] 章铮.进城定居还是回乡发展——民工迁移决策的生命周期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6,(07):28.
- [11] 罗明忠.农村劳动力转移后回流的原因:逻辑推演与实证检验[J].经济学动态,2008,(01):65.
- [12] 原新,王海宁,陈媛媛.大城市外来人口迁移行为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学刊,2011,(01):50.
- [13] 曾旭晖,秦伟.在城农民工留城倾向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与经济,2003,(03):50.
- [14] 吴兴陆.农民工定居性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人口与经济,2005,(01):5.
- [15] 张宗益,周勇,卢顺霞,等.西部地区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动因及其对策[J].统计研究,2007,(12):12.
- [16] 陈秋红,黄颖.我国农村劳动力回流的原因及对策[J].农业经济,2011,(08):54.
- [17] 杨云善.农村劳动力“逆淘汰”式转移[J].社会主义研究,2007,(03):109.
- [18] 姜艳虹.农民工回流对我国农村区域结构和新农村建设的影响[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01):47.
- [19] 张素华,刘志平.农民工回流对中国城市化的影响[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9,(01):58.
- [20] 蔡之兵,周俭初.中国逆城市化危机研究[J].天府新论,2014,(04):65-70.

[责任编辑:许海燕]

The Analysis of the "Reflux" of Rural Migrants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YU Jia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325035,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eflux" of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is experiencing from "survival" to "social rationality" because of the together influence of the factors like economy, institution and society. The "reflux" phenomenon can be divided into active "reflux" and passive "reflux.", in which the latter not only reflects the hard life of migrant workers in cities, but also will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of China. The major forces pushing the rural migrants back to country from cities include, on one h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imperfect systems and insufficient social recognition;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troduction of preferential agricultural policies, blood and kinship, and geopolitical factors etc. To better this phenomenon, it's suggested to construct small towns, expedite policy stipulation,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new farmers, and develop multiple rural economy.

Key words: Rural migrants; reflux; driving factors analysis